

百年

回首看潮头

——
论现代散文

王嵩 著

BAINIANHUISHOU
KANCHAOTOU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作者简介：王嵩,1960年5月
出生，山东省牟平人。
1983年7月毕业于东北师范
大学中文系。曾在黑龙江省
佳木斯大学任教。现为福建
省闽江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散文，
写作学。在有关学术期刊发
表论文二十余篇。



百年回首看潮头

——论现代散文

王 嵩 著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回首看潮头:论现代散文/王嵩著. —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8.4

ISBN 978-7-80691-385-7

I. 百… II. 王… III. 散文—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0443 号

责任编辑:柳闽南

百年回首看潮头——论现代散文

著 者:王 嵩

出版发行: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出版中心 12 层

网 址:www.hcsy.net.cn

邮 编:350001

印 刷:福州超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9.5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691-385-7/I·39

定 价:23.00 元

目 录

五四散文源流辨析	(1)
形似而实异:五四散文与晚明小品	(18)
从文体特征看五四散文成功的原因	(39)
胡适散文论	(51)
纪实传真 写生传神	
——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	(89)
陈西滢:意态从容,“闲话”天下	(112)
苏雪林的散文艺术	(140)
钱歌川的随笔艺术	(167)
谈天说地 饮食男女	
——苏青散文的精神内核与审美倾向	(204)
附录:	
当虚则虚 当实则实	
——论散文的真实性	(270)
论散文的真情实感	(281)

五四散文源流辨析

—

溯本求源,是人类天性,更是深入认识事物,把握规律的必要途径。对于开百代新运的五四新文学,尤其成就最大的五四散文,其源流动因,流程流向,由于涉及现代文学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中与西这个核心问题,有藏往知来之功,自然更成为人们长期追索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早在五四时期,诸多参与者、亲历者就从不同角度对之作出了种种解释,如陈独秀强调其发生的原因在于“产业发达人口集中”,^[1]罗家伦则从大背景上归纳出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四方面原因,又从消极、积极两方面归纳出直接原因,注重外部因素对五四新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2]又突出强调了是“中国与世界文学接触的结果”。^[3]其他如朱自清、陈子展、傅斯年等人都有相关论述。从国内到国际,从政治、经济、文化到文学自身,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而影响最大的当数胡适、周作人的有关意见。胡适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首倡者,在1922年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把中国文学分为死的文言和活的白话两部分,认为五四新文学是千余年来白话文学的有意识的主张和展开。同时又强调发动者个人的经历、古代白话作品的影响、西方文化的传入、科举制度的废除、清廷的推翻等“多元的个别的因素”。^[4]周作人虽然提出:“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

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5]大体上看,这种分析还是比较客观平稳的,但是从他有这方面的一系列演讲、序跋看,他真正强调的是内因,并且把历史上的言志派锁定在晚明小品,一再强调:五四文学革命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是明代公安派主张的“复活”,以及晚明小品与英国随笔“合成”中国现代散文源流的主张。^[6]

上述种种解说,一方面都出于深入思考五四新文学的来源和流向,审美路径和价值取向,都在为五四文学、五四散文“寻根”;另一方面则在于为自己的文学观以及自己的创作寻求“合法性”依据。不过,解说尽管各有侧重,各不相同,看似眼花缭乱,但其思路却无非如洪峻峰序俞兆平《现代性与文学思潮》所说:“一为‘外缘模式’,注重从政治、经济、社会思潮、文化环境等外部因素来解释学术思想、文学思潮的变迁。”而“另一为‘内理模式’”其特点在于“注重从系统内部基本问题的不断解决揭示其演变的理路。”^[7]此后相当长时间内,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实际上也不外这两种模式,依然是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主张的推演细化,或二者的调和折中。直到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多学科交叉运用及各种新方法的应用,取得了许多新的丰富的成果。但还是有两方面问题不能让人满意。一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研究展开得比较广泛深入,但是对五四散文的相关研究还不够具体,虽然二者有从属关系,上位问题的解决可以大体回答下位问题,但各文学类型间毕竟还有各自不同的情况,有具体的区别。二是随近年闲适散文、性灵散文的再度兴起,尤其文化寻根的大潮之下,周作人的看法重新引起许多人的重视,尤其是循其“现代散文受外国的影响最少。”^[8]的看法,专注于寻找影响较多的一方面,

力图通过向晚明小品等的“寻根”，给五四散文以发生发展的民族性、合法性地位。问题是许多研究看似探源，实则仅截其流，看似持之有故，却是蔽于一曲，缺乏对现代散文全面的历史考察和理解。出现了过度阐发晚明小品对五四散文的作用，夸大晚明小品的价值等现象。如有学者认为：“诗歌、小说、现代戏剧主要接受了外来文化影响，其文学形态和传统形态有了巨大差异，而散文虽也受到外来影响，但却是深深植根于悠久而优秀的古典散文的传统之上，其中尤其晚明小品起了较大的作用。”^[9]应该说，关于现代散文的源流及成功原因，许多学者都持相近的观点，归因于传统的深厚，把晚明小品视为现代散文的直接源头。这类认识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这里对“散文受外国影响最少”未加详审。一方面，这种最少只是与其他文类比较而言，就散文自身看，其实无论从文体观念还是风格体式，尤其思想价值、精神境界，影响多多，同样既深且巨，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另一方面，这种相对的最少，主要的原因在于散文的文体特征。因为散文就是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作者的学识、情感、人生体验、性格禀赋本身，没有更多的技巧规则，也没有更多技巧可学。而在价值取向、审美观念、知识结构等散文核心内容方面的外来影响则是有目共睹的。否则，中国同样有悠久而优秀的古典诗歌传统，《诗经》以降，源远流长，唐诗宋词的影响力，更非晚明小品之可比。同样的历史语境，何以诗歌受外来影响就多至“面目全非”呢？此外，就“悠久而优秀的散文传统”而言，只突出晚明小品或只溯及晚明小品，其间未免省略了太多的散文史细节。就五四时期的传统散文阅读影响角度而言，从主要散文家的风格体式看，晚明小品的影响也未必胜于两汉、六朝、唐宋八家乃至其他明清之文，甚至桐城文章。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散文史》认为，不能把晚明小品“目为我国现代散文的直接源头，但应该承认从这时起我国的散文已有不得不变的

趋向。”^[10]

从人类文学发展形态看,无论欧美还是中国,要创造新的现代化文学,都只有两个可以获取资源的地方:国内的传统和国外的传统。五四散文是在清算批判“载道”文统流弊并顺承清末民初“新文体”的同时,自觉吸取以英法为主的西方散文观念,主动借鉴外国散文作品,从而完成自身的理论建设和文体尝试的。在这个过程中,面临创作理念的更新、知识体系的调整、风格典范的确立等多重问题。而如何转化西方散文观念,如何重新阐释和建构散文传统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一般而言,对现代散文源流的研究,两个方面不可偏废。钱基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公认的保守片面之作,但其中也不乏可资参考的意见。比如他早就认为,在处理中西方文学传统的态度上,“榘而为论,其弊有二:一曰执古,一曰骛外。何为骛外?欧化之东。浅识或自菲薄,衡政论学,必准诸欧,文学有作,势亦从同”,而“茹古深者又乖今宜,崇归、方以不祧,鄙剧曲为下里,徒示不广,无当大雅。兹之为弊,溢曰执古。”^[11]这方面的道理,今天的学者应该认识得更为清楚深刻,所以在研究梳理现代散文源流问题上,在现代散文所涉古今、中外等大问题上,不可执于一端,见喻起义,应该“外缘”、“内理”并重,古今中外统观。更重要的是,通过历史语境、文化心态、文学观念、理论主张、文本形态的真切考察,精心梳理传统散文、晚明小品、清末新文体以及外国散文与五四散文的关系,庶可近于本来面目,以期辨明五四散文的源流。

二

五四散文与晚明小品同为中国散文的组成部分,其间自然有种种内在联系和承继关系,有若干相近相似之处。尤其有上世纪

20年代中后期至30年代的积极推介学习,这种联系更加引人注目。但五四散文却绝非晚明小品精神的再现和复兴。所谓相似相近,文学史上,文学变革、文学革新、文学革命,都具有一定的反叛性,都有反传统、反时流的态度,这是变革、革命的基本精神和取向。不如此何来变革更新。因而,辨析其间的关系,要看其所持主张、思想、理论建构形态、文本形态各方面的异同;而渊源影响的梳理更应该看是否有据,看其理论来源、精神来源;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是所见略同的异代感应,还是自觉的借鉴仿效,这些都需详加实证性的确切研究。

第一,从历史语境看,五四时期的历史语境及普遍的文化心态是“趋新”,而外国的东西在许多人眼中就是新的代表。无论是陈独秀的“以欧化是为”,胡适的“输入学理”,都以极大的热情大力输入西方思想文化,并以之作为衡评一切思想文化、文学价值的标准。唐德刚在谈及海外学者论述胡适由美国返华参加新文化运动而遭到敌视的论述时评价说:“他不知道中国近代史上,士大夫最崇洋的一段便是民国初年那一段,那时的美国留学生才真是说一不二。连袁大总统想做皇帝也要以哥伦比亚大学的古德诺教授一言为定呢!”^[12]当时,即便保守派攻击新文学,所寻求的也往往是域外的根据。翻阅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参与者、散文作家的有关文论,几乎难觅晚明小品的踪迹。反倒是积极自觉地主张取法西洋吸取西方散文观念者为多。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明确提出:“创造新文学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这里的工具指的是文学革命的要点问题即语言文字——以白话取代文言。而他提出的方法则是:“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因为“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做我们的模范,即以体裁而论,散文只有短篇,没有布置周密、论理精严、首尾不懈的长篇,……不能说理,不能言情的‘古文’”;

而“西洋文学的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13]这里姑且不论他对传统的态度是否正确，而只在强调时人尤其是文学革命倡导者、领导者的一种自觉主张。这一点很重要。胡适在谈及有千余年白话传统，有丰富白话文学作品的中国古代文学为何没有演变出白话的“国语的文学”时，强调的就是缺乏有意识的白话文学主张。此外，傅斯年提出在白话散文发端时需有所凭借，一方面可以凭借“精纯的国语”，但更主要的还是凭借“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和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欧化的国语文学。”^[14]即便最早提出晚明小品是现代散文源流的周作人，在1921年发表著名的被视为现代散文文体自觉、文体理论建构第一块基石的《美文》中，倡导“治新文学的人”去试作“美文”，并说“中国古文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但更突出强调的还是“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我们可以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但是须用自己的文字与思想，不可以去模仿他们。”^[15]到1926年作《〈陶庵梦忆〉序》，他才提出：“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而“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16]1928年的《燕知草》跋则进一步提出：“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17]而到1932年在辅仁大学作《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系列演讲，才明确提出：“胡适之的‘八不主义’，也即复活了明末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只不过又加多了西洋科学哲学各方面的思想，遂使两次运动多少有些不同了，而在根本方向上，则仍无多大差异处。”^[18]周作人作为现代散文文体理论的主要建构者，“最近十年内‘小品散文之王’。”^[19]他的系列论

述自有其独到的眼光与考虑,周作人等倡言晚明小品性灵、闲适、自我等主张并予以切合当下语境的阐释和发挥,有助于抵制文学功利性,纠偏五四对传统片面偏激的态度,在对待现代与传统的态度上,在维护文学的自主性、自觉性上,都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但应该知道的是周作人这种“重写文学史”的行为,如吕若涵分析的那样:“其思路的萌芽是由小圈子的兴趣继而引起阐发散文的传统渊源。”而其目的则在于张扬其“言志”的文学主张,抵制当时的左翼文学,“争取文学话语权”,并非是出于学术目的的精细分析。^[20]未免如钱钟书所说,为了“表示自己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向古代也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自”,是“事后追认先驱”,“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在文学史上数见不鲜。”当然“它会影响创作,使新作品从自发的天真转而为自觉的有教养、有师法;它也改造传统,使旧作品产生新义,沾上新气息,增添新价值。”^[21]更应注意的是,以周作为代表的“言志派”,在散文观形成的过程中,无论在创作原则上,还是创作内容、文体笔调上,英国随笔的传播和影响都起了重大而深刻的作用。而且,包括周作人在内的现代散文文体理论建构者,“都从英国随笔中找到与正统古文异质的范本”并“从而实现了散文观念的现代化的变革。”“并启发他们重新审视古典散文传统”,从而“重新建构自己的散文艺术观。”而“这种重新发现、重新评估的现象固然根源于时代审美尺度的更新,但也和英国随笔这一新的参照物的出现有关,事实上也是英国随笔的热心评介在先,晚明小品的重新评估在后,推崇晚明小品的散文家往往先前就是英国随笔的传播者。”^[22]总之,五四时期,除1926年起周作人等在小范围内对晚明小品有所讨论外,在五四散文理论建设方面,晚明小品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而且,从其时的文学观念看,甚至是对之取排斥、轻视态度的。当时影响最大也是得到普遍认同的是胡适的

“白话文学”论和“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准此以观,文言的晚明小品自然被视为“死文学”。胡适也曾明确表示,比之于明代的白话文,“公安竟陵也都成了扭扭捏捏的小家数了”,^[23]评价并不高。

第二,五四时期的散文家,不仅对晚明小品没有自觉的、有意识的追索、借鉴;甚至晚明小品对大多五四散文家而言,无意的潜移默化也谈不上,至少比较勉强。对此,通过当时的阅读接受情况以及散文家的传统散文修养方面寻得端倪。众所周知,清末民初、五四时期相继出现了评介外国思想家著作及外国文学作品的热潮。这一潮流对五四散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既有文学性因素,也有非文学性因素;既有散文的影响,也有其他文学样式的影响。如影响较大的严复的“八译”等,使人们知道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三权分立”等等现代观念,更新了国人的思想,改变了散文的思想内容。而“林译小说”等则使人们对外国文学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影响了文学创作的同时,也培养了新的文学家和接受群体。五四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之风大盛。仅就散文而言,1918年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21年周作人的《美文》倡导取法英法随笔之后,出现了译介外国散文作品与有关理论的热潮。对散文理论建设和创作较有针对性和影响的,有胡梦华的《絮语散文》、毛如升的《英国小品文的发展》、方重的《英国小品文的演进与艺术》、林疑今译《小品文作法论》、梁遇春编译《英国小品文选》、袁嘉华译《英国散文选》、王文川译《英国小品文选》、梁宗岱译《蒙田散文选》、谢六逸译《日本近代小品文选》、缪崇群译《日本小品文》、鲁迅译《出了象牙之塔》和《思想、山水、人物》、黎烈文译《西班牙书简》、石民译《英国文人尺牍》及施蛰存译《西洋日记集》等等。此外,还有大量散见于报刊的散文作品。如德国尼采、诸多英国小品作家的作品、日本跟岸派的写生文,以及屠格涅夫、波德莱尔、泰戈尔、王尔德、正冈子规外、坂本文泉、长冢节等的散

文诗。国别广泛,品种繁多,极一时之盛。尤其以蒙田、兰姆、赫士列特为代表的18世纪后期英、法作家的随笔,进入了当时的“热读”,影响极大。应该说明的是,五四散文家大多有留学背景,大都能直接阅读外国散文,大都有翻译作品,这样自然使得其对于外国散文的风格体式有更为直接的体会与把握。

反观晚明小品,应该说自清代遭到贬抑甚至禁毁,到此可谓尘封已久,这“地下的河流”,尚未被挖掘出来。周作人说:“现在只就散文说与明代的有些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有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24]恰好从侧面说明晚明小品当时的阅读状况。至于深受周作人影响,积极认同附和其主张的林语堂,虽然被陈平原认定为真正继承公安三袁衣钵的人,但他迟至1930年代才“识得袁中郎”。具体看,1930年代左右,尤其语丝派兴起后,才出现陈子展所描述的:“书架上不摆部公安竟陵派的东西,书架好像就没有面子;文章里不说到公安竟陵,不抄点明人尺牍,文章好像就不够精彩;嘴边不吐出袁中郎金圣叹的名字,不读点小品散文之类,嘴巴好像就无法吐属风流;文坛上这个赶时髦的风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什么人开头?”^[25]那种阅读晚明小品热。即便如此,历史地考察,这一派散文仍不是当时散文的主流。一直受到主流文学的批评。此外,就五四时期散文家的中国传统散文内在修养积淀而言,从主要散文家的散文风格体式看,晚明小品的影响也未必胜于先秦诸子、两汉、魏晋六朝、唐宋八家、宋儒语录乃至其他明清之文,甚至桐城古文。如包括周氏兄弟在内的太炎弟子,多推重魏晋六朝之文,周氏兄弟的文章深受魏晋六朝影响是公认的。

第三,大体而言,反抗传统、个性解放、尊己向俗、以今为尚、反对复古摹拟、重视独创、抒情言志、自然真实诸点,是许多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晚明小品与五四散文的相同之处。这些看法不乏可取之处,但是也存在似是而非、粗疏空泛的问题。深入看,五四散文与

晚明小品无论在时代文化背景、主体的价值取向、理性精神、知识结构上,还是主题、题材、体式各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区别,是形似而实异的。

透过上面分析大致可以看出,五四时期,人们对晚明小品缺乏自觉的认识,晚明小品并未进入当时的“热读”,而未经“热读”空言产生影响,是值得怀疑的。这是周作人等为“寻根”,逐渐加强阐释,层累叠加不断赋予意义的过程。陈子展在《公安竟陵与小品文》中指出:“公安竟陵是着重个人的性灵的言志派,‘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者似是着重社会的文化的载道派(暂时不妨承认有所谓言志派载道派),所以新文学运动,有时被人从广义的说,称为新文化运动。因此,我们论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倘非别有会心,就不必故意杜撰故实,歪曲历史,说是现代的新文学运动是继承公安竟陵的文学运动而来。”^[26]而新文学、新散文的由来,应该说在顺承清末新文体的同时,主要还是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余英时评述李长之关于五四运动的认识时说:“五四作为一种文化运动,首先必须请楚地理解作为一种文化外借运动;或者用他的话说,一种移植西方文化到中国的运动。”^[27]五四散文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一种从文学观念到体式风格等方面的广泛外借。从大的方面看,胡适的“八不主义”深受欧美意象派影响启发,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分明受到19世纪西方思潮的影响;胡适的“历史的进化文学观”、陈独秀的“社会文明进化说”、周作人的“人的发现”,都是以西方生物进化论为基础而形成。从五四散文观念的形成及文体的确立看,也是如此。无论散文理论建构如美文、纯散文等观念的提出,还是风格体式,同样有重大而深刻影响。即便是所谓抒情言志派散文观,在创作原则、创作内容、文体笔调上,也深受英法随笔的影响。包括周作人在内的现代散文文体理论建构者,“都从英国随笔中找到与正统古文异质的范本”并“启

发他们重新审视古典散文传统”，从而“重新建构自己的散文艺术观。”而“事实上也是英国随笔的热心评介在先，晚明小品的重新评估在后，推崇晚明小品的散文家往往就是英国随笔的传播者。”^[28]

三

从文体演进角度看，五四散文的直接来源，恰恰是五四散文的主要倡导者、创作者所一再强调与五四文学不同的清末新文体与白话运动。所谓“迄于清季，词融今古，理通欧亚，集旧文学之大成而要其归，蜕新文学之化机而开其先。”^[29]

第一，按学界通行的定位方式，五四以后产生的白话散文，可以分为“杂文”、“记叙抒情的散文小品”、“散文诗”、“文艺性通讯”四类，如细分则不下二三十种。可见五四散文品种的繁多，显非晚明小品可比，而且散文诗、文艺性通讯更是直接受外国文学影响产生的新品种。因而可以说，即便晚明小品与五四散文有某种渊源，也只能是其间的一种——现代小品散文，严格地说只能是其中的“言志派”小品散文。从另一个方面看，五四散文的许多新变因素，许多种类都源于清末民初。“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已经开始了民族存亡背景上的外部与内部的双重的现代化努力，许多观念性的变革在1898年前后发生。”^[30]清末文学各界革命对于五四新文学的影响，首先在于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格局的确立。它打破了传统文学观念中以诗文为正宗，视小说戏曲为“小道”的旧观念，在文类秩序重排中突出了小说的地位，并从总体上把文学的地位提高到了中国文学史上未曾有过的高度。同时，借助引进西洋文学的四分格局，基本确立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现代文学格局。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格局的确立，为五四

文学革命奠定了基础。就散文而言,标志性的变革是“文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新文体的广泛流行。文界革命虽然在观念上揭示不多,但突破了传统散文陈旧的思维模式,并形成了“新文体”散文创作的热潮。新文体摆脱了桐城古文的束缚,强调把古文从“义理、考据、辞章”中解放出来。其特点正如梁启超所自道:“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31]梁启超这些“笔锋常带情感的”政论文以“欧西”和日本的思想内容取代了圣贤经典章句的义理,以间杂俗语、外来语的新颖文字丰富文章的表达,以希腊、罗马的雄辩体和英法近代随笔体改变文章体式。具有空前的开拓精神创造精神,承担了散文的觉世作用。除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新文体作家外,革命派的章太炎、邹容、秋瑾、章士钊等也有各自的散文变革主张和实践,他们共同形成了当时散文创作的热潮,开中国现代政论、杂文的先声。而众所周知,五四散文正是以杂文的成功为开端的。另外,戊戌前后出现的介绍异域社会风气的游记、随笔,如张裕钊的《西洋杂志》、吴汝纶的《东游丛谈》、单士厘的《归潜记》、容闳的《西学东渐记》、蒋梦麟的《西潮》等,开风气之先,是现代记叙性散文的先导。至于文体表达各方面出现的条理明晰、格式新颖、语言平易畅达、采用口语、俚语、小说家语、吸收外国文法、句子中限制词增多,出现繁复长句、倒装句,以及突出的逻辑性、论辩性、形象性等诸多因素,使散文更加贴近时代,贴近生活了。个人心灵和意志成为散文的基本出发点,初露启蒙色彩。这些都为五四散文做了种种新变的准备,为五四散文奠定了最初的文体模式。

胡适在《近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认为晚清白话运动采取了二元的态度,存在较大缺陷。周作人附和此说并进而认为:“他